

要素禀赋、价值权衡与国家力量： 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早期探索的基本逻辑

王 昉 高 山

摘 要 经济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线索与关键命题。通过构建“要素禀赋—价值权衡—国家力量”的分析框架，可以对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内容和思想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以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基本认知为逻辑起点，所提出的农业优先战略、工业化战略及重工业赶超战略等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是基于民生改善、发展模式转型和保障经济安全等多元价值目标之间的权衡，并且考量了国家力量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应具备的能力要求，有其内在的基本逻辑。这一时期知识界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构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早期理论探索，也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借鉴与历史启迪。

关键词 经济现代化 禀赋条件 价值权衡 国家力量 基本逻辑

作者王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高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 F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11-0048-14

一、引言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懈探索和推进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①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变革和综合性进程，其本质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维向度的全方位转型。其中，经济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维度和重要标志，不仅是一个时代命题，而且是一个历史命题。晚清以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与现代化诉求的双重驱动下，开启了对国民经济现代化路径的持续性理论探索，从晚清经世学派基于“中体西用”框架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有限接纳，到民国时期逐步转向系统性的制度转型思考，特别是20世纪30至4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问题的集中讨论，将对现代化问题的认识推向了新的阶段，其理论价值不仅体现在回应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与需求，更在于构建了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分析框架并尝试建立自主的现代性话语体系。

目前学界关于20世纪上半叶经济现代化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

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及政策实践的整体性考察^①；二是对这一时期“现代化”概念的生成演变、涵义转化与基本特征的研究辨析^②；三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的专题性探讨。^③总体而言，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理论谱系形成发展的源流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充分探讨。特别是对20世纪上半叶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理论争鸣的系统性梳理有待进一步深化，对经济现代化议题在这一时期引发广泛讨论的多重动因和历史语境等层面的深入思考仍较为薄弱，此外，对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历史承继关系的理论探讨仍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在集中梳理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讨论内容和思想脉络的基础上，厘清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现代化问题讨论的历史语境，进而分析知识界从“现代化”向“经济现代化”认知转变的深层动因，通过构建“要素禀赋—价值权衡—国家力量”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早期探索的内在逻辑。其中，要素禀赋是经济现代化思想的认知起点，价值权衡构成了经济现代化多元目标的重要考量因素，国家力量是经济现代化的推动主体。这一时期知识界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仅构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早期理论探索，也为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借鉴与历史启迪。

二、从“现代化”到“经济现代化”的话语转换

（一）“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

任何国家都有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可能，正如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④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动态和相对的概念，从17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拓展。^⑤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等国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反思总结经验的需要，20世纪50至70年代欧美知识界深入开展了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广义上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指从传统前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方位转型过程，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等所有领域内的变革。^⑥总体而言，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一是强调“传统”与“现代”的二分范式；二是主张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内部动因论；三是认为现代化过程具有趋同性。^⑦

经济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概念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聚焦，可理解为狭义上的现代化或工业化，即工业革命以来各国或地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具体而言，包括经济社会的市场化和工业化两个层次。^⑧市场化即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包含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以及市场机制原理的根本性特征改变，并且均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⑨工业化则表现为生产技术和设备的进步与飞跃，重要特征之一即从手工劳动转向机器生产。根据“经济增长阶段论”的观点，实现“经济起飞”需要有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工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重视经济现代化的政治集团的出现作

①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此外，Margherita Zanasi（2006）在 *Saving the Nation: Economic Modernity in Republican China* 一书中对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对经济现代化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吉尔伯特·罗兹曼（1989）在其所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中分析了中国18世纪到20世纪经济结构和增长的转变；城山智子（2010）在《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中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② 参见潘光哲：《想象“现代化”——一九三〇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解剖》，《新史学》2005年第1期；孙宏云：《中国“现代化”观念溯源——〈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③ 参见李荣臣：《“五四”后三十年中国现代化思潮评述》，《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阎书钦：《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现代化”理念的形成及内涵流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顾海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及其思想史意义》，《经济思想史学刊》2023年第2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⑤ S. 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沈原、陈育国、迟刚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⑥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⑦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⑧ 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⑨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页。

为必要条件。^① 总体而言,经济现代化表现为生产方式和市场体系等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是推动社会整体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力。

(二)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学界关于“现代化”的认知转向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基本上是对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发展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到 20 世纪 20 年代,“现代化”一词和相关概念散见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著述中,并且往往将“现代化”与“西化”“欧化”等同使用。^② 同时,对经济现代化的概念与涵义已有初步讨论。如文学家、翻译家夏丏尊在翻译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时,将中国的现代化理解为农业文明向商工文明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设施的改善、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变化。^③ 思想家、文学家胡适也主张建立起“技术与工业的文明作为我们民族新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基础”^④,强调技术化与工业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随着“现代化”概念的传播、运用和推介,知识界对“现代化”内涵的认知发生了重要转向,逐步开始以“现代化”取代“西化”概念来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有意识地将“现代化”视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选择性的路径框架,使其与西方经验相分离,认为“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⑤,并且更为关注经济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

这一时期知识界的关注重点从“现代化”转向“经济现代化”具有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如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为缓解和转嫁危机加紧了对华的经济侵略;1931 年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深刻局势变化,激发了民众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形式上统一的国家政权等因素的影响。^⑥ 因此,“经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不仅是晚清以降“求富”“自强”等呼声的延续,更与彼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外政治和经济危机密切相关。1933 年《申报月刊》的编者前言写道,(中国)若“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⑦ 已经认识到现代化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并引发了知识界强烈的反响。

1933 年 7 月,《申报月刊》刊行“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主要关注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与先决条件、基本路径与发展道路等重要问题,是 20 世纪 30 年代知识界有关现代化问题讨论的一次高潮。^⑧ 这次讨论明确将“经济现代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议题。特辑的《编者后记》中提到:“现代化的范围固然很广,包含着政治,文化,学术和社会制度等等方面,但其主要之点,却在国民经济的改造,工业化和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些“都是中国目前所最需要的,所以我们这一次讨论,特别注重在这一方面”。^⑨ 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广泛参与了这场讨论,并就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形成了基本共识。大多数学者将工业化和产业革命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并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作为其重要标志。如经济学家张素民认为,工业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政治和文化上的选择与现代化并无必然关系^⑩;经济学家郑林庄将生产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生产机械化、生产合理化及生产计划化三个方面^⑪;社会学家、教育学家陶孟和则从经济与政治文化等上层社会结构关系的视角,认为现代化的首要在于经济生产,尤其是工业化和机械化,推动经济关系变迁需要将其置于制度变迁的整体维度加以考量^⑫;学者杨幸之认为,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经

①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4、8 页。

② 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

③ 田中义夫:《马尔萨斯的中国人口论》,丐尊译,《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10 期,1923 年 5 月。

④ 胡适:《文化的冲突》,张景明译,《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29 年英文版,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368 页。

⑤ 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23 期,1935 年 6 月。

⑥ 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2018 年第 6 期。

⑦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编者前言)》,《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

⑧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 14 页。

⑨ 《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编者后记)》,《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

⑩ 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

⑪ 郑林庄:《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

⑫ 陶孟和:《中国现代化问题》,《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

济的改造与生产力的提高，其实质是完成彻底的产业革命。^①可见这一时期围绕经济现代化的讨论呈现出明显的生产主义特征，工业化和生产力的提高构成了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总体而言，《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特辑的探索，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界有识之士对中国现代化现状、进路和意义的积极思考，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②

除《申报月刊》外，《独立评论》《东方杂志》《新经济》《经济建设季刊》《大公报》以及《食货半月刊》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众多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的文章。时任《独立评论》主编的胡适对《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其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观点论述过于空疏。他在《建国问题引论》一文中指出，彼时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师法外国”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兼顾效仿外国制度方法和本国历史经验教训的问题，中国目前所积累的病症“恐怕还没有急骤追随世界先进国家的能力”，唯有“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从而“在那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③还有学者意识到“现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也应考虑到除经济因素以外其他维度的影响。如万巨星指出“现代化”不能只以物质文明发展作为价值标准，也应关注到精神文明的发展。^④20世纪3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如马寅初、何廉、方显廷和刘大钧等，都相继发表了大量讨论经济现代化问题的文章与著述。如马寅初在《中国经济改造》中写道：“任何国家，欲立足于此横流遍地之世界，必须在经济上谋得出路，而在经济上谋出路之不二法门，便是积极在经济方面奋斗。”^⑤此外，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国民建设运动”，更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界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关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知识界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认识和思考深度与20世纪50至6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相比也毫不逊色^⑥，虽然缺乏对经济现代化问题予以系统建构和学理分析的自觉性，存在一定不足，但与当时客观经济实践水平以及现代化刚起步的现状是相一致的。^⑦

从“现代化”到“经济现代化”的话语转换，不仅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问题思考的深化和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主动探索，也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需求，即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双重目标下优先推动经济基础的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认知构成了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思想的起点。

三、经济现代化的起点：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认知

要素禀赋理论强调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禀赋在其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长期的历史观察表明，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与其拥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这一因素紧密相关，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被称为“资源依赖型发展”的黄金年代。^⑧一国经济现代化路径的构想与实现，需要建立在对本国资源禀赋和具体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国民生活积贫积弱，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对西方经济现代化改革方案的照搬并无法直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逐渐显露出西方单一范式与中国复杂国情之间的错配脱节和不适应性。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克指出，“从长期来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孟森也认为，“即现代化之人，亦曰一国自有国情国故国俗等等，

① 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

② 顾海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论争及其思想史意义》，《经济思想史学刊》2023年第2期。

③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期，1933年11月。

④ 万巨星：《何谓现代化》，《中兴周刊（武昌）》第5卷第3期，1935年8月。

⑤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自序”，第1页。

⑥ 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第55页。

⑦ 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⑧ Edward B. Barbie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2.

⑨ 西里尔·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杨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导论”，第5页。

不能即以违国情背国故异国俗之他国政法蒙之，他国人物主之”^①，均强调了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实际开展现代化的必要性。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学术界广泛开展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其范围涵盖了货币、工业、农业和物价等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② 通过这些翔实的调研，中国知识分子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意识到同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要素禀赋差异，进而从中提出了属于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不再仅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问题”中国化。总体而言，可将近代中国经济禀赋的特征概括为三点：农业为主的二元经济、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稀缺的工业资本。

第一，农业为主的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是指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常见现象。^③ 农业在近代中国依旧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直到 1933 年，整个现代工业产值（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官僚资本的企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 10%，全国人口的 85% 是农业人口。^④ 因此，对经济现代化的讨论必须关注农业的现代化问题。根据刘大钧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现代工业的布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结构畸形，表现为现代工业和服务行业过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上海和长江沿岸的部分城市，而中国农村腹地依旧保持着落后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⑤ 当时学者对中国农村经济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卜凯与陈翰笙，但两者对中国农业问题的认识却不尽相同。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因此他提出的针对性措施主要有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⑥ 而陈翰笙则批评其对中国土地分配和租佃关系的认识不够准确，忽视了造成中国农业落后的制度性因素。^⑦ 这些调查研究认为，中国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规模的家庭分散经营，且经营效率十分低下，完全依靠无限地投入劳力来维持。他们主张只有建立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农业组织，才能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程度，从而有效改变这一状况。

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是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力和普遍现象。20 世纪 30 年代，李景汉、陈达等学者相继开展了规模不等的人口调查，这些调查统计相较于人口普查更为具体和严谨，为近代人口问题的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支撑。^⑧ 1928 年至 1936 年这一时期中国全国人口总数为 51078.9 万，按照每户 5.18 人计算，共 9860.8 万户，相较于 1912 年的人口总数 45524.3 万，增长了 12.20%。^⑨ 此外，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长期居于首位。以 1913 年为例，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 24.4%，而同期西欧各国合计占比为 14.6%，美国人口占比为 5.4%^⑩，凸显出中国人口规模的巨大。依托相关人口数据，学者们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对人口问题进行了讨论。如经济学家褚葆一指出人口密度过大是实现工业化的阻碍因素。中国的大量人口能否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推力并有效转化为劳动力资源，将取决于政府的工业化政策方向。同时，随着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能加以改善。^⑪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等人认识到中国的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使得其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欧洲的低生育率国家相差无几，反映出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严峻的生存环境，因而只有提高人口质量才是改变当前困境的正确途径。^⑫

第三，资本稀缺和结构性错配问题。20 世纪初，随着欧美列强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① 孟森：《现代化与先务急》，《独立评论》第 77 期，1933 年 11 月。

② 郑娟、梁捷：《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 期。

③ 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④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 年，第 300 页。

⑤ 参见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 年。

⑥ 张霞：《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贵州社会科学》2010 年第 9 期。

⑦ 陈翰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1930 年 7 月，转引自《陈翰笙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 页。

⑧ 吕文浩：《被遮蔽的光彩——李景汉与中国近代人口调查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⑨ 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⑩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40 页。

⑪ 褚葆一：《中国之人口与工业化》，《经济建设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44 年 1 月。

⑫ 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 年以来）》，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第 25 页。

资本输出日益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① 特别在 1920 至 1936 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包括直接投资和借款）由 1920 年的 20.18 亿美元增长至 1936 年的 39.41 亿美元，净增 19.23 亿美元，增幅为 95.3%，是外国在华投资发展最快的时期。^② 这一时期，民族工业资本仍有发展但增长率已大不如前，1936 年包括东北在内的民族工业资本仅有外国资本的 74.4%^③，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本稀缺问题。而推进经济现代化需要保障充足的资金来源。当时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在现代化初期合理利用外资，如经济学家戴霭庐指出：“至于充裕资本的步骤，第一是利用外资，第二是增加国民资本，第三是利用国民资本，如有必要，仍旧可以利用外资。”^④ 学者亦英则认为不能完全依靠外资，“如果完全依靠外资，以发展中国，直是等于断送中国”。^⑤ 此外，资本的结构错配问题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关注。方显廷指出，近代工业资本的筹集与运用存在两方面错误，一是在筹集方面未能充分利用外资，二是在运用方面偏重民生工业而忽略了国防工业。他认为应效仿苏联，尽力积聚民族资本，同时“为补充民族资本之不足，外资自不妨利用”^⑥，但应保持主动地位。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知识界已经意识到中国近代社会在经济禀赋条件层面同先发国家的较大差距及现实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作为经济现代化关键起步条件之一的要素禀赋，影响着当时学者对经济现代化目标选择和实现方式的思考与度量。同时，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基本认知，也从内涵上强化了经济现代化的“中国元素”，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基本动力和重要支撑。

四、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多元价值权衡与路径选择

经济现代化要求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系统化转型。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争鸣中，对经济现代化目标的思考表现为在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民生改善及保障经济安全三种价值目标之间的多元权衡。作为目标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不同学者基于对各价值目标取舍、排序与协调，在不断深化对经济现代化认识的过程中构建起具有差异性的路径选择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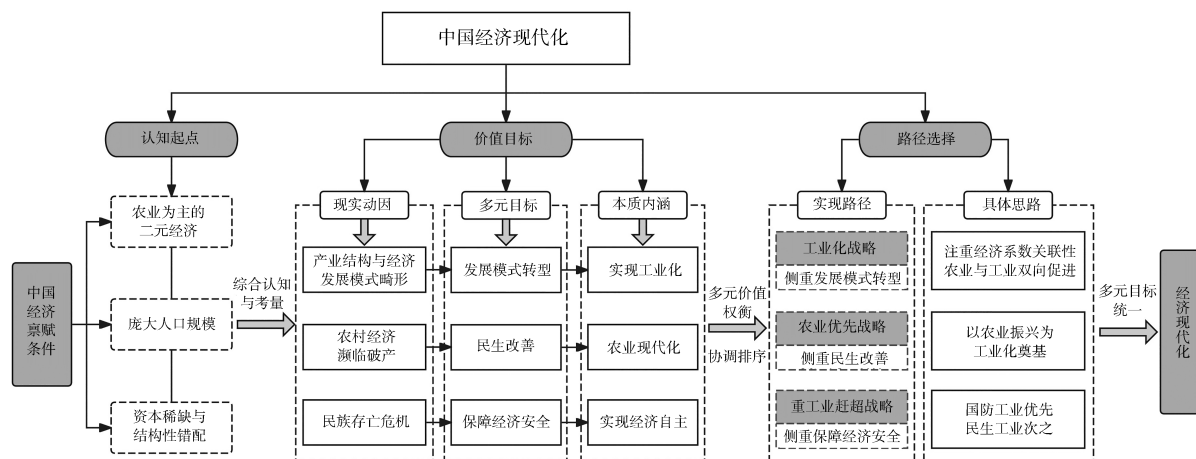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的认知起点、价值目标与路径选择示意图

（一）发展模式转型、民生改善以及保障经济安全之间的价值权衡

20 世纪 30 年代的知识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了系列讨论，旨在对中国经

①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刘兰兮等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506 页。

②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30、12 页。

④ 戴霭庐：《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

⑤ 亦英：《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

⑥ 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问题》，1936 年 4 月，转引自方显廷：《方显廷文集》第 4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274—275、283 页。

济形态作出总体性概括,从而明确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如方显廷认为,“吾人欲知中国现代经济之症结,首须对于中国现代经济之本质加以分析”^①。由此,他提出了“中古式与半殖民地式经济”或“半殖民地化之中古经济”来概括中国经济的性质,并认为要改变这一局面唯有“现代化自主经济之建设”。^②这一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认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民生改善以及保障经济安全等在内的多元价值取向。

首先,实现发展模式转型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当时知识界已经认识到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在于内外双重困境影响下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畸形。经济现代化对于彼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意味着需要改革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模式,推动生产方式的革新,进而实现整体生产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发展模式转型在此时主要表现为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基于这一问题意识,知识界对工业化的讨论达到了高潮,集中出版了一批相关成果。包括何廉和方显廷(1930)的《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吴景超(1938)的《中国工业化的途径》、方显廷(1936)的《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等。这些成果不仅强调了工业化在中国经济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深入探讨了实现工业化的具体路径和方式。

其次,民生改善也是当时对经济现代化问题考量的价值目标和评判标准。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国民党政权建立后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到1934年,全国农村经济几乎濒临破产。^③自然生态环境和田水利设施的恶化更进一步加剧了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如1931年,苏、皖、赣、鄂、湘、豫、浙、鲁等8省290个县发生水灾,受灾民众达1亿多人,农产品损失达4.57亿元。^④以拯救农业和农村为核心的民生改善问题是当时思考经济现代化问题的重要考量。20世纪30年代,诸多学者对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农业经济著作和文章也相继出版和发表,如陈翰笙(1934)的《中国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何廉(1936)的《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卜凯(1936)的《中国农家经济》等。这些著作从农业生产经营和技术的改良、农业组织形态、土地租佃关系等多维视角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展开了分析研究,为民生改善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再次,保障经济安全是经济现代化多元价值目标中的重要维度。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存亡危机是推动经济现代化问题讨论的重要动因。学者们认为,实现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是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由贸易的世界主义精神已然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新趋势。如若中国不顺应新出现的保护主义潮流,则将更容易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因此,许多学者主张构建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并将保障经济安全视为经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之一,在经济思想层面呈现出鲜明的保护主义特征。如马寅初针对日本“以走私为破坏之工具,希图扰乱中国的新币制”的企图,认为应当统制货币加以应对,而解决走私的根本方法是“组织健全之工商同业公会及统制经济”。^⑤吴景超也认为在经济方面“假如同业公会有普遍的组织”,那么政府的统制经济也可以顺利推行。^⑥

(二) 经济现代化实现路径的分歧与争论

1. 农业优先发展战略与民生改善。

在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论争中,基于对不同价值目标的优先考量与协调侧重,主要形成了农业优先战略、工业化战略和重工业赶超战略三种取向。其中,农业派主张应以农村为核心推进经济现代化,在价值目标层面更侧重于民生改善维度。基于对中国以农业为主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禀赋条件的认知,农业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作为人口基数庞大的农业国,在工业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农业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基于此,农业派主张从农村和农业入手,通过农业振兴为工业化奠定基础,总

① 方显廷:《中国经济之症结》,1936年9月,转引自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30页。

② 方显廷:《中国经济之症结与统制》,1936年9月,转引自方显廷:《方显廷文集》第5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97、204页。

③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刘兰兮等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第746—747页。

④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3册(1927—193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19页。

⑤ 马寅初:《国防经济》,1937年2月,转引自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9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3、377页。

⑥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1938年,转引自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2页。

体上有三方面辩护思路：

首先，农业派认为当时中国经济的症结在于农业衰退与农村人口过密。因此，要改善当时的民生问题，必须从农村入手。如经济学家漆琪生认为，“农业生产，是国民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生存与生活之根本……救济农村，建设农业，则最直接而迅速的可使贫苦农民，获得苏生之机会”，“农业经济，至今犹为中国国民经济主要而中心的生产部门……所以农业经济之消长，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之隆替”。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经济建设的任务“乃是挽救当前的经济零夷之危机，消弭险厉的经济恐慌，以奠定国民经济之基础，准备将来积极的前进发展”^①。也只有深入探讨中国国民经济的实质，才能明悉解决此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农村经济。

其次，在近代中国，农业经济仍旧为国民经济的中心生产部门，这一现实条件决定了工业化战略必须建立在农村振兴的基础之上，形成“以农促工”的发展模式。如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基于中国经济现实情况，认为“所谓工业化，要在生产技术的进步。此于中国今日社会至为必要，无法否认拒绝”。而只有“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唯一可能的路”。“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②学者姚溥荪也指出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大量商品倾销的冲击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严重不足，因此他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必须依靠国内市场，而传统小农经济的落后导致农村市场发育不足，无法为工业品提供有效的需求支撑，因而应优先发展农业，振兴农村经济。^③

再次，农业派认为经济现代化具有阶段性发展的特征，需要走从农业现代化到工业化循序渐进的道路。如郑林庄认为，“在中国今日所处的局面下，我们不易立刻从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阶段跳入一崭新的工业经济的阶段里去。”只能逐步地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并且这一工业经济形态“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因此，我们现在所应急图者……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④即认为工业化进程应通过农村经济的内部转型逐步实现。

2. 工业化战略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与农业派不同，工业派则希望协调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民生改善的目标，并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视为改善民生的手段。工业派同农业派在中国农业是否具有发展潜力这一问题上具有不同观点。农业派认为，虽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相对低下，但还有提升的潜力空间，可通过机械化、工业化等生产技术改进及合作化等制度体系改革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发展国民经济。而工业派则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潜力已经发挥到极限，达到了“高水平均衡状态”，技术改进和制度变革都难以改变这一现状。如吴景超等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口过剩。农业派救济农村的主张只是治标之策，而治本之策是将农村过剩人口因势利导，通过工业化吸收农业过剩劳动力，并以人口城市化来改善农村问题，农村通过引进规模化和机械化等现代生产方式，最终实现良性循环，缓解农村和农业经济危机，稳定国民经济的基础。

因此，工业派也并未忽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只是采取方式不同，更为看重经济系统的整体关联性。马寅初曾发表多篇文章强调发展农业或内地的轻、小工业，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他指出：“农业不振兴，实业亦绝无发展之可能。如等于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无购买能力，试问实业界所制造出来的商品，谁来光顾购买？贫穷的农民徒有欲望（Want），苟无购买能力，则欲望不能成为有效的需求（Effective demand）。有供而无求，是经济恐慌之所由来。”^⑤提高并改善农民消费能力的具体措施是，一方面加强工业建设，推动具备资源、技术、市场、原料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实业发展，并且“因为各种重工业需要资本很大，并须有很精良的专门技术，如果是样样都要举办，以中国的力量，实一时不易办到”。因此“除了关于国防需要的重工业必须举办外，要从轻工业先行办起”。^⑥二是推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通过农业的集约化和机械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工、农业立国之争与此前的争论具有显著差异。20世纪20年代的工、农业立国道路之争仍是基于中西文化之争的内在逻辑。章士钊等人的“以农立国”主张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思想

① 漆琪生：《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心安在——重工呢？重农呢？》，《东方杂志》第32卷第10期，1935年5月。

② 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1935年6月。

③ 姚溥荪：《不复兴农村中国也可以工业化吗？》，《独立评论》第137期，1935年1月。

④ 郑林庄：《我们可走第三条路》，《独立评论》第137期，1935年1月。

⑤ 马寅初：《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1期，1945年1月。

⑥ 马寅初：《中国要早日实行工业化》，1935年8月，转引自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9卷，第1页。

和文化保守主义观念等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① 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已基本形成了实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共识，即便是主张以农立国的梁漱溟、漆琪生、杨开道和董时进等学者，也是将农业问题置于更为广泛的工业化问题中加以论述。工农业立国之争并非完全对立的主张，其本质是两派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形成了差异化的认识，在发展模式转型与民生改善的目标之间具有不同权衡，因而在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优先发展序列层面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在“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的争论中，对经济现代化的理解都以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为基础，只是前者更加注重民生改善的价值目标，而后者更加注重经济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将发展模式转型置于价值排序中更为优先的位置。正如方显廷所述，两派争论“似各趋极端，实非无调剂之余地。盖一国经济建设为一整个问题，农业与工业有相互之连带关系；奇重奇轻，皆非所宜。工业无农业以供原料，则工业不振，农业无工业以供制成成品，则农民之消费及生产两方面，均受损失”。^②

3. 重工业赶超战略与保障经济安全。

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经济现代化价值目标中经济安全因素的考量被提高到了核心地位，大多工业论者的观点逐渐转向了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模式。重工业赶超派认为应优先发展对国民经济具有引领性作用的重工业产业，并在长期与短期目标之间进行有意识的战略规划。如在卢沟桥事变后，吴景超的观点就发生了转变，认为其过去探讨工业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时，关注重点“是在工业化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而“中国现在需要工业化，还是不易的真理，但我们目前所急待建设的工业，应为国防工业及与国防工业有直接关系之重工业。民生工业的建设，应居于次要的地位”。^③ 方显廷在 1937 年之后也转变了看法，认为“重工业或基本工业，为一切工业之母，其发展较轻工业尤为迫切”。^④ 主张今后中国工业资本“宜以国防工业为首要，而民生工业次之。盖立国于兹武力压倒公理之世界，欲图富强，自必先强而后富”。^⑤ 国防工业是强国的唯一途径，而民生工业的发展则是富国之道。

著名学者翁文灏是重工业赶超派的代表，他从 1938 年起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负责全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⑥ 翁文灏谈及国家经济建设中民生工业与国防工业孰先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应以国防为中心。虽然两者本应相辅相成、同时兼顾，但是在局势动荡的时代，国防建设为“现代国家保障安全及维持主权之必要措施”，并且需要以整个国家利益为前提。^⑦ 翁文灏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资金必有大量优先用于重工业建设和大规模开发。^⑧ 此外，当具备矿冶、机械、电器和化学等基本事业，“则中国经济，如水有源，其流可以不枯，如树有根，其枝叶可以繁荣。”^⑨

总体而言，大多数改革者都支持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方案，认为其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维度。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体同构的过程，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但究竟何种工业化道路最适合中国国情却未达成共识，其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对经济现代化多元目标之间的多重权衡和考量。随着抗日战争局势进一步的紧张，争论趋于统一，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也暂时转向了战时经济这一更为紧迫的问题。

五、经济现代化的推动主体：国家力量

从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早期探索的思想内容中可以看出，虽然知识界对经济现代化

① 参见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1988 年 6 月，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文选》，第 23—24 页；钟祥财：《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1 期。

② 方显廷：《吾人对于工业化应有之认识》，1935 年 2 月，转引自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年，第 599 页。

③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1938 年，转引自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 229 页。

④ 方显廷：《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1936 年 11 月，转引自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第 74 页。

⑤ 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问题》，1936 年 4 月，转引自方显廷：《方显廷文集》第 4 卷，第 283—284 页。

⑥ 孙大权：《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

⑦ 翁文灏：《经济建设方针》，1938 年 1 月，转引自翁文灏著、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380 页。

⑧ 翁文灏：《国防经济建设之要义》，1941 年 7 月，转引自翁文灏著、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 421—422 页。

⑨ 翁文灏：《关于国营事业之意义》，1945 年 11 月，转引自翁文灏著、李学通选编：《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第 650 页。

实现路径的认知具有差异性，但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对国家力量的强调却是当时的基本共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二是国家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与能力要求。

（一）国家力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强调国家在社会行为规范与秩序建构中的主导性功能。马克思、恩格斯以国家固有的阶级属性为起点，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当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为了使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各种冲突，并“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① 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暴力优势。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一经掌握政权，建立代表其利益的政府、监狱和法庭等国家机器，国家会在相应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指导下，通过制定和颁布有利于保护其统治阶级利益的各项制度，反作用于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从而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使其与先进的生产力相适应，提高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之间的有机统一。

国家力量推动经济现代化的路径机制表现为，通过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相互嵌构作用于经济实践，进而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基于国家、产权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论证了制度变迁对经济绩效的作用影响。他认为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产权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契约是由政治决策过程界定并实施的，而经济利益结构也会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然而“政治过程的决策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运行”。^② 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基于政治经济制度二分法的维度，进一步认为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催生了包容性经济制度，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③ 总体而言，国家能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制定与落实产业政策、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互补作用和提升官僚组织效率等方面。^④ 20世纪30至40年代的知识界主要从理性化经济系统、实施后发赶超、保障民生以及维护经济安全四个维度探讨了国家力量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一是将国家干预作为经济系统理性化的实现方式。当时有学者认为面对近代中国有限的资源禀赋特征，经济现代化不能是一种自发性和试错的过程，必须依靠更为合理的生产决策来发展经济。如学者董之学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确立进步的经济政策来改造涣散的小农发展，经过相当的发展之后，再开始从各经济部门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⑤，并且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他们认为达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是可以合理计划并有效执行的，而国家干预正是经济系统理性化的实现方式。刘大钧指出“经济的国家化必须有国家经济设计”，政府应从全国利益出发，指导工商业的创办和发展，或与商界合作。^⑥ 学者姚铁心认为国家经济在实现方式上或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经济国家主义或集团经济等实现方式，但均“实为时代之要求，环境之急需”。^⑦ 国家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通过更合理的生产安排，可以避免资本无序性竞争对生产力的破坏，实现最大程度的产出增加。

二是通过国家力量补足经济现代化开启的必要条件，进而实施后发赶超。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应采取国家导向的大推进战略。^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7页。

② 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58、133页。

③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272页。

④ 李康：《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能力：源流、内涵与意义》，《经济思想史学刊》2023年第3期。

⑤ 董之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

⑥ 刘大钧：《经济政策国家化》，《旁观》第6期，1932年12月。

⑦ 姚铁心：《国家经济论》，《银行周报》第21卷第8期，1937年3月。

⑧ 张凤林：《经济落后的历史审视·译者前言》，2008年3月，转引自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审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译者前言”，第iv页。

由于俄、日等国“后发外生型”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示范效应^①，并且考虑到中国当时资源禀赋与实现现代化的紧迫性，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也提出了类似的表达。如翁文灏、吴景超等认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无法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足够剩余，要想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推动条件。因此，政府不仅要直接介入经济现代化过程，而且需要成为现代化的实际组织者。只有采取集中统一的领导，才能依靠国家力量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能力，在较短时期内缩短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② 国家介入经济的主张，其内核是一种“有意识的设计”经济发展的思想。

三是国家需要承担经济转型过程中改善和保障民生的责任。在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现代国家应当负有“维持生活标准以及经营整体经济的责任”。^③ 马寅初等经济学家认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福利问题，主要是由于国家在社会政策层面的缺位。因此马寅初主张将福利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当经济层面的个人生存遭受威胁时，国家有必要介入经济运行来保障各阶层基本的权利需求。同时，一些知识分子也注意到，不同阶层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国家应当尽可能地保障底层民众的基本生计。此外，也有学者也从交通、外贸、财政和金融等多维视角探讨了国家对于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④

四是国家应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当时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的重要原因是受到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如杨幸之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须先消灭障碍中国前进的反动堡垒，把中国人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魔掌里夺回来”。^⑤ 陶孟和在分析“现代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势力”时指出，“每个国家是一个经济团体，推行一定的经济政策，每个国家保护本国工商业者，每个国家利用经济力，增进自己人民的生活，更利用经济力以剥削工业不进步的民族。”^⑥ 马寅初和刘大钧等认为当时中国必须依靠国家实施反倾销、平关税、保护幼稚产业等政策来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剥削，从而实现中国自主的经济现代化发展。^⑦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主张经济全面的国家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主张采用单一的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私有经济和自由竞争的价值，承认经济自由的必要性，希望在国家组织和市场之间谋求第三条道路。如吴景超等学者即认为政府不应将生产事业全部收归管理，主张“中国工业化的工作，一定是政府与人民合作进行，政府既非束手旁观，也不包办一切”，“政府当然要承担一重要部分，也许是最艰难而不易获利的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分”^⑧。刘大钧认为交通、金融与贸易作为全国经济脉络，应予以统制，其他各种事业以不统制为原则，其中特殊原因须由政府实行统制的作为例外。^⑨ 国家应寻找到计划经济与自由竞争之间的平衡点，从而更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国家力量的作用。

（二）国家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与能力要求

国家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有效互动、经济资源的整合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近代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主要包括以下维度：优化整合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财政能力、提高经济领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以及全面的行政官僚系统改革，提高自上而下经济制度供给的效率和完善自下而上收集信息的能力。从而确保国家能够在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发挥引领和调节作用，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社

① 方显廷认为，“统制经济之声浪，复弥漫于全世界，东起日俄，西迄英美德法，莫不以局部的或全部的经济统制为经济复兴之要策。而苏俄之第一次五年计划，得于四年内超过原定限度而告完成，实为促进统制经济之主因也”。参见方显廷：《统制经济与中国》，1935 年 1 月，转引自方显廷编：《中国经济研究》上，第 58 页。

② 孙大权：《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

③ 化人：《民生主义的国家观》，《政治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29 年 3 月。

④ 参见栗寄沅：《民生主义的交通政策》，《建设研究》第 5 卷第 3 期，1941 年 5 月；祝世康：《民生主义的金融政策》，《革命理论》第 8—9 期，1942 年；章友江：《三论民生主义对外贸易政策》，《时事新报（重庆）》1942 年 10 月 4 日，第 2、3 版；柯炽：《民生主义国家财政本质论发凡》，《经建季刊》第 3 期，1947 年。

⑤ 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申报月刊》第 2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

⑥ 陶孟和：《国民经济的独立》，《现代评论》第 2 卷第 43 期，1925 年 10 月。

⑦ 参见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册，第 307 页；刘大钧：《世界经济潮流与我国国难》，《经济学季刊》第 3 卷第 4 期，1932 年 12 月。

⑧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途径》，1938 年，转引自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 253—254、241—242 页。

⑨ 刘大钧：《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年，第 154 页。

会全面发展。

一是国家应优化其整合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财政能力。如吴景超所述，国家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现实中国家财政积弊已久，额外的税负对人民而言更是严苛的负担。20世纪3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从理论基础、历史发展和税收特点等层面探讨税收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如吕调阳列举了税收起源的公需说、交换说、保险说和义务说等理论，并由此总结分析出当前的赋税改革是对过去理论的综合，以期达到“令国家的财源，多是直接由资本家而来”的目标。^①学者李锐通过梳理相关税制改革的变化指出，当时的政府税制缺乏公平和经济（效率），而改革内容除了裁撤厘金以外都只是浮于表面，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税收情况较为复杂，中央政府难以全面掌握。^②财政学家崔敬伯等人则重点关注了间接税到直接税的改革。他认为间接税并非都是糟糕的，直接税并非都是好的，这应当由具体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税制内容来决定。^③同时，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多次全国财政会议，邀请了诸多经济学家参加。这些经济学家广泛参与了政府财务行政的完善、关税自主方案设计、国地收支划分以及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新税创立的财政体制改革与实践。^④

二是国家应提高经济领域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货币作为重要的经济公共产品，成为当时经济现代化讨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缺乏国内货币体系和国际白银贸易之间的屏障，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衰退的蔓延扩散，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冲击。^⑤当时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部门的关注核心都是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避免中国货币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和影响。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和赵兰坪等学者对币制改革和通货管理问题展开了较多讨论。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尚不健全的货币体制阻碍了对外贸易流通的发展，新的货币政策需要将金融市场纳入正轨，从而更好地反哺作为工业经济基础的农村经济，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⑥一些学者还分析了货币战争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影响。如钱俊瑞分析了美、英、日三国对中国货币权的争夺，并指出币制改革加剧了中国货币对英镑的依赖。日本对华北地区的侵略以及美国压低银价以动摇汇率等因素，使中国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边缘。^⑦

三是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全面的行政官僚系统改革。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稳妥推进，应重视政治组织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强调政权的统治能力和政府权威。^⑧1932年在东北调查的国际联盟专家考察团在官方报告中多次论及“中国现代化问题”，其中英国学者陶内认为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建设一个“效力较高”的政府。^⑨当时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经济建设方案层出不穷，设立的经济建设机构也冗杂重叠。翁文灏直言：“行政官吏惰废因循，经济机关浪费散漫，缺乏系统，为知识分子所不满，即是政治危机，应从速彻底整理。”^⑩很多学者对国家干预的最大顾虑也正在于此。如马寅初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事业，皆以政府负其全责为原则，必其政府有高尚道德，伟大人才，强固权力，方克有济。我国承数千年之积弊，官僚敷衍颟顸，军人跋扈飞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虽力事改革，百废俱兴。而积重难返，所谓整顿，未能尽如所愿，中央政府实力微弱，今尚不足以语此”。^⑪顾翊群、唐庆增、李卓敏、蒋廷黻、宋则行等人也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具备“贤明的果断的政府和组织严密的国家”^⑫，经济学家伍启元也指出经济建

① 吕调阳：《论当今赋税改革之理论根据》，《湖南省银行经济季刊》第1卷第5期，1943年10月。

② 李锐：《中央政府近四年来之税制改革》，《经济统计季刊》第2卷第1期，1933年3月。

③ 崔敬伯讲、郭荣记：《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税制改革的批判与展望》，《河北月刊》第4卷第11期，1936年11月；崔敬伯：《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续）——税制改革的批判与展望》，《国闻周报》第14卷第26期，1937年7月。

④ 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⑤ 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孟凡礼、尚国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⑥ 宋漱石：《币制改革后的上海金融市场》，《绸缪月刊》第2卷第12期，1936年8月。

⑦ 钱俊瑞：《国际货币战与中国币制改革》，《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1期，1936年1月。

⑧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第334页。

⑨ R. H. Tawney：《中国的政治》，蒋廷黻译，《独立评论》第36期，1933年1月。

⑩ 翁文灏：《翁文灏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7页。

⑪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册，第5页。

⑫ 李卓敏：《论“战后经济建设”》，《新经济》第4卷第5期，1940年10月。

设需要“有一个政治清明、励精图治的政府”。^①而在当时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很多主张国家力量干预经济的学者都将目光投诸行政体制改革领域，如丁文江主张推动行政制度彻底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保障官吏的廉洁，二是构建健全的行政组织，三是重视科学技术与专门人才。^②

总体而言，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知识界关于国家力量与经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与探索，为后发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借鉴。这些经验表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如何在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形下有效发挥国家力量，如何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找到平衡，协调和满足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多重目标的追求，仍然是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

六、结语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中国知识界对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既体现了学者们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的现实关切，也展现了其对现代化问题思考的多重逻辑与深层认知。从理论逻辑看，学者们以认识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基本特征为起点，探讨如何在多元价值目标的权衡中推进经济现代化，并强调了国家力量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实施路径及其能力要求。从历史逻辑考察，这一时期的思想争鸣深刻反映了在民族危机与现代化诉求交织的特定历史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这一过程不仅是对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延续与传承，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必然性。在实践逻辑层面，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不仅为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论证，更构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本文所提出的“要素禀赋—价值权衡—国家力量”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进路，分别对应于这一时期学者们关于经济现代化的认知起点、多元目标与推动主体的系统性思考，为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现代化思想早期探索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提供了崭新视角。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知识界对经济现代化道路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对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仍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启示。

第一，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领导作用。近代以来，各种现代化方案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对经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虽富有前瞻性，但仍停留在“中国的现代化”层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构建起独立自主、结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③，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和重要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④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两个结合”这一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才能实现从“中国的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第二，应在深刻把握中国具体国情和经济社会实践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五大本质特征。^⑤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现代化道路应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实际，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改革方案。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禀赋条件的深刻认知，学者们开展了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独特道路的思考与探索，并未盲目遵从西方理论对经济现代化标准、目标及实现路径的界定。现代化作为世界各国经历的一场系统性历史变革，其实现路径具有多样性。西方“现代化理论”

① 伍启元、马寅初、吴大琨：《如何建设国民经济》，《中国建设》第 3 卷第 2 期，1946 年 11 月。

② 丁文江：《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的条件》，《大公报（天津）》1935 年 7 月 1 日，第 2 版。

③ 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 年以来的历史轨迹》，第 204 页。

④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求是》2025 年第 1 期。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2—23 页。

的解释只能体现现代化的“共性”或“普遍性”，而不能揭示各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个性”或“特殊性”。^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突破了历史上各种现代化模式的局限，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更加注重中国经济独特的结构特征与制度优势，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增强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持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与实践要求的系统性理解。

第三，应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早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知识界即已认识到国家力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及其应具备的能力要求。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持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是要深入推进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多元协同治理。二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整合资源、统筹协调并系统集成各方力量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动形成政党—国家—社会协同共治、互强互动的治理逻辑。^② 三是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③，因此，应不断优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高水平安全之间实现持续的良性互动，为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本文系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历史与思想研究”（202011093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沈 敏）

Factor Endowments, Value Trade-offs, and State Power: The Basic Logic of Early Exploration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deas

WANG Fang, GAO Shan

Abstract: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s the core clue and key proposi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By construct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actor endowment-value trade-offs-national power”, this paper comprehends and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discussion and ideological lineage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study finds that scholars in this period took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hina's economic endowment condition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the proposed path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such as the strategy of giving priority to agriculture, the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catching up with heavy industry, were based on the trade-offs among multiple value goals, such as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and guaranteeing economic security, etc., and they also took into account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ate's power in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its ability requirements. I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mportant role of national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the capacity requirements it should possess, and has its own internal basic logic. The in-depth thinking of intellectuals on economic moderniz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not only constituted an early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provided valuable ideological reference and histor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endowment conditions, value trade-offs, state power, basic logic

① 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 年以来的历史轨迹》，第 282 页。

② 刘舒杨、王浦劬：《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光明日报》2021 年 11 月 2 日，第 11 版。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22 日，第 1 版。